

導言

朝鮮戰爭(1950–1953)激戰正酣的1952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詩人洪淳哲率隊訪問中國四個月。洪在此期間創作了一本詩集，留下許多讚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新中國的頌歌，其中他專為杭州西湖作長詩一首，題為〈歌頌人民的西湖〉。詩中主題明晰：在舊社會，西湖是「封建地主」、「寄生蟲」、「吸血鬼」的玩物；而在「新中國」，同一片湖水已為「勞動人民」所擁有。詩歌結尾寫道：

勞動人民的鮮血造成的這個樂園裡，
在那些曾騎在勞動人民頭上的寄生蟲們坐過的地方，
已經坐上了勞動人民；
千百年來遭受踐踏的西湖，
已經變成了新中國人民的西湖。¹

差不多同時，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實業家和政治活動家黃炎培(1878–1965)亦曾創作西湖組詩十四首，遍述其個人對於新中國西湖的感受，詩歌的主題包括「水庫」、「舟子」、「僧道」及「革命烈士」等。組

1 洪淳哲，《光榮屬於你們：訪華詩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頁113–115。

詩最後以題為〈人民西湖〉的七言絕句作結，詩中黃炎培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萬國簪裙友好濃，新妝襟筆舞勞工。
湖山今日人民有，處處紅旗照水紅。²

此二首詩涉及同一個關鍵詞——「人民」。馮麗達 (Krista Van Fleit Hang) 認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人民」是政府部門職位和組織機構的修飾語，用於傳達一種「新中國誕生的樂觀情緒」。³「人民」一詞貫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適用於各類不同的政治環境，構成了中共政府的權力合法性來源。⁴阿敏達·史密斯 (Aminda Smith) 指出，「人民」這個被高度政治化但定義不明的類別，最初象徵著一個集體，「它超越工農業勞動者，將知識分子、遊民乃至資產階級也包括在內。」⁵然而，「人民」和敵人之間的界限在不斷變化。⁶借用古斯塔夫·勒龐 (Gustave Le Bon) 的說法，「人民」始終被「樹立為一種神秘的實體」。⁷

這個「神秘的實體」在上述兩首詩中有了新的維度——國際主義。這一特色正是當時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大背景的反映。在北韓詩人洪淳哲的詩中，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的西湖象徵著世界「人民」孜孜以求的和平與繁榮，和帝國主義擴張造成的戰爭與動亂形成極大反差。⁸黃炎培則強調西湖新的功能，即這一風景名勝已成為全世界人民的相聚之地。

2 黃方毅編，《黃炎培詩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頁332-338。

3 Krista Van Fleit Hang, *Literature the People Love: Reading Chinese Texts from the Early Maoist Period (1949-1966)*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7.

4 Hung Wu, *Remaking Beijing: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Creation of a Political Spa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85.

5 Aminda M. Smith, *Thought Reform and China's Dangerous Classes: Reeducation, Resistance, and the People* (Lanham, MA: Rowman & Littlefield, 2013), 28.

6 同上，頁222。

7 Gustave Le Bon, *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 (Mineola, NY: Dover, 2004), 69.

8 洪淳哲，《光榮屬於你們：訪華詩鈔》，頁128。

在這個意義上，「人民」的範疇超越國界，彰顯出一種社會主義下的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國際主義者不僅有意識地建立「一種秉持相同價值觀、思想體系和風格的共同文化」，⁹ 更容許乃至「強調各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¹⁰ 既然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提倡融合各民族文化，同時又突出其獨特性，那麼杭州——這個歷史上著名的國際大都市，威尼斯探險家馬可·波羅（1254–1324）最心心念念的地方¹¹——無疑是研究毛澤東時期（1949–1976）「自然」這一概念的變遷及其在國內外政治影響的不二之選。

本書聚焦於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著重介紹共產黨治下的新政權如何通過重置空間、重塑景觀（包括風景性景觀和生產性景觀）以及改造文化來打造「人民的西湖」。本書將綜合討論1950年代至1970年代在西湖地區推行的五項舉措：西湖疏浚工程、花港觀魚公園建設、植樹造林運動、西湖地區村莊集體化養豬事業，以及西湖周邊的兩次平墳運動。一方面，上述工程或政策達到了下列切實可見的成果——有足夠水深的西湖、一個風景優美的大型公共園林、一大片繞湖的青山、蓬勃發展的養豬業和不斷提高的豬肥生產力，以及幾乎所有墳墓都消失殆盡的湖景；另一方面，這些舉措也成為黨在人民群眾中間宣傳新時代新社會的極好素材。因此，我將這些工程稱為「宣傳—運動工程」。在「人民的西湖」這一表述中，作為修飾語的「人民」具有雙重含義：他們既是中國城市和自然空間的新主人，也需要接受黨的再教育。正如阿甘本（Giorgio

9 Nicolai Volland, “Clandestine Cosmopolitanism: Foreign Litera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7–1977,”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6.1 (February 2017): 186.

10 Kyrill Kunakhovich, “Ties That Bind, Ties That Divide: Second World Cultural Exchange at the Grassroots,” in *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Cold War: Exploring the Second World*, ed. Patryk Babiracki and Austin Jersil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136.

11 Hewlett Johnson, *China’s New Creative Age*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73), 44.

Agamben) 所述，「人民」既是「統一政體的公民綜合體」，也是被領導階層的成員。¹²

其次，中國共產黨改造西湖地區的嘗試為人類與非人類參與者創造了新的可能性。他（它）們可能從當局的規劃中獲益，也可能阻礙甚至破壞這些規劃。對於毛澤東時代下人民對黨的政策反應，不少學者頗為關注。以毛時代的杭州為例，已故學者高崢曾指出，當地市民有時會對強加於他們的「顛覆性變革」非常抵觸，需要一定的調整。¹³ 而這種調整往往是雙向的，比如南下幹部對杭州本地生活方式進行了有意識的自我適應（如接受飲茶文化等）。¹⁴ 相比之下，本書更著重探討人類與非人類（包括水、微生物、水生植物、公園、豬、樹木、害蟲和墳墓等等）的「能动性」（agency），如何影響、偏離或阻礙新政權的社會政治規劃。本書批判的一個對象是將人類與自然界存在物區分開的「兩分法」。眾所周知，雖然這種區分是「非歷史」的（即無視歷史觀點與歷史語境，將一些概念看作超越歷史的存在），但不管是在學術書寫還是保育政策理念中都相當常見。基於這種非歷史的兩分法，一些著作指摘毛時代的政策侵擾了自然界的原生和穩定狀態。他們認為，若非人為介入，自然本應不受外力影響，亦可避免生態惡化的災難。¹⁵ 比如夏竹麗（Judith Shapiro）之《毛與自然的戰爭：革命時期中國的政治與環境》（*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將共和國

12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6.

13 James Z. Gao,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216.

14 同上，頁155–156。

15 Michael R. Dove, Percy E. Sajise, and Amity A. Doolittle, "Introduction: Changing Ways of Thinking abo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in *Beyond the Sacred Forest: Complicating Conservation in Southeast Asia*, ed. Michael R. Dove, Percy E. Sajise, and Amity A. Doolittl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1.

時期黨的經濟政策以及人的活動與自然對立起來。¹⁶ 而本書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特殊的政治文化置於更大的歷史背景下。在這一時期，中國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就，但在重建環境的過程中問題也隨之而來。借用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的說法，與其他政權一樣，1949年後中國的社會政治有其自身特有的「生態困難」。¹⁷ 因此，本書將重點探討政府和人民前所未有的改造西湖大規模運動中，自然、政治和文化之間複雜關係的歷史性。

毛澤東時代的西湖與杭州

作為南宋 (1127–1270) 都城 (稱為「行在」或「行都」)，杭州是南宋盛衰興敗的一個縮影。¹⁸ 南宋滅亡後，杭州成為「中國的文化地標」。¹⁹ 與此同時，由於持續不斷的疏浚和維護工程，西湖在千年中渡過了嚴重淤積和沼澤化的危機。²⁰ 因此，有人認為西湖早就是一個人造水體。這種說法在學界得到普遍認同。例如汪利平在其博士論文中強調「西湖景

16 Judith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7 David Harvey,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Oxford: Blackwell, 1996), 189.

18 Christian de Pee and Joseph Lam, "Introduction," in *Senses of the City: Perceptions of Hangzhou and Southern Song China, 1127–1279*, ed. Joseph S. C. Lam, Shuen-fu Lin, Christian de Pee, and Martin Power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7), xiv.

19 Xiaolin Duan, *The Rise of West Lake: A Cultural Landmark in the Song Dynasty* (Seattl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3.

20 《浙江省水文志》編纂委員會，《浙江省水文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137。

觀的人工性」。²¹ 清朝（1644–1911）滅亡後，地方政府和商家開始利用西湖美景以及與杭州相關的文化想像，發展旅遊事業。²² 1916年滬杭鐵路建成後，以吸引上海遊客為目的的商業旅遊更成為杭州的經濟支柱。如此，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杭州成為典型的「消費城市」。但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一直致力於將「消費城市」轉型為「生產城市」。早在建國前半年多，《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定下改造中國城市的基調。²³ 然而，將杭州轉變為生產型或工業型城市的嘗試並未如中共設想的那般順利。正如迪恩·拉格（Dean Rugg）指出，共產主義國家中絕大多數城市都可定義為「部分轉型」的城市，因為政府雄心勃勃的城市開發工程和工業化項目往往受到「舊的歷史因素」的制約。²⁴ 杭州正是這類城市的典型代表。1950年代初，蘇聯城市規劃專家穆欣（A. C. Maxim）提議，「將杭州發展為一個以休閒、旅遊和文化活動為主的城市」，並建設成「國際會議的中心……享有『東方日內瓦』的美譽」。這一建議令杭州的改造與規劃愈加複雜。因此，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1953–1957），中央並無意將杭州工業化。高崢觀察到，第一個五年計劃的697個主要工業項目無一落地杭州。²⁵

穆欣的意見並非中共重新定位杭州的唯一原因。毛主席的個人志趣也推動了杭州的空間和文化規劃。1953年12月至1954年3月，毛主席為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在杭州逗留數月，從此便格外喜愛這座城市，稱杭州為他的「第三故鄉」。1953年到1975年，他訪問杭州

21 Liping Wang, “Paradise for Sale: Urban Space and Tourism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Hangzhou, 1589–1937”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997), 8.

22 同上，頁343。

23 〈把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人民日報》，1949年3月17日。

24 Dean S. Rugg, *Spatial Foundations of Urbanism* (2nd Edition) (Dubuque, IA: Wm. C. Brown, 1979), 314.

25 Gao,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217–218.

多達40餘次，杭州的一個別墅群成為毛在北京之外的「紫禁城」。²⁶由於毛主席對杭州情有獨鍾，其私人攝影師侯波（1924–2017）曾戲言，可以考慮將杭州設為中國的「兩個首都」之一或者位於南方的首都。²⁷

在整個毛澤東時代，杭州的地位始終非常突出。1950年代初期，浙江省委書記譚震林（1902–1983）²⁸和杭州市委主要領導王平夷（1912–1970）²⁹都曾將杭州比喻為「東方日內瓦」，並指示加快完善設施建設與文物修復工作，以服務國內外廣大遊客。為此，專為高層領導和外賓而設的高級旅館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其中既有重新建造的，也有在舊有的別墅或寺院為基礎上翻新的。較為著名的有杭州飯店（於1956年完成）和劉莊（於1953年和1958年兩次改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前三十年，杭州接待了為數眾多的外國高層訪客，包括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克利緬特·伏羅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1881–1969）、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Sukarno，1901–1970）、柬埔寨國王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Norodom Sihanouk，1922–2012），以及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1913–1994）。1972年2月26日，尼克松總統在劉莊下榻，當晚斟字酌句，為起草並簽署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上海公報》做最後準備。³⁰可見，在整個毛澤東時代，杭州的文化意義和政治價值無可比擬，對杭州的改造也成為黨政治目的指引下重塑自然和城市空間的一大標誌。

26 同上，頁221–222。

27 葉建新，《毛澤東與西湖》（杭州：杭州出版社，2005），頁133。

28 余森文，〈杭州解放後17年的園林建設〉，載政協杭州市委員會文史委編，《杭州文史資料（第19輯）》（1997），頁153。

29 趙信毅，〈王平夷同志在杭州〉，載政協杭州市委員會文史委編，《杭州文史資料（第7輯）》（杭州：政協杭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6），頁4。

30 Richard Nixon, *R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78), 573.



圖 0.1 西湖地圖。「花港觀魚」是第 2 章中探討的新設計建造公園。「劉莊」是毛澤東寓居的別墅。「南山大隊」是第 4 章中討論的養豬示範單位。「孤山」是墳墓群的所在地，將在第 5 章中詳細討論。

政治宣傳與宣傳國家

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將建設「毛的新世界」(洪長泰語)提上日程。洪認為，要實現這一目標，在空間上重塑中國至關重要。³¹ 因此，重建城市(如北京)是黨致力於將中國轉變為一個宣傳國家的重要環節。³² 彼得·凱內斯(Peter Kenez)認為，蘇聯之所以是一個「宣傳國家」，是因為傳播政治理念「對國家政策的形成與執行至關重要」。³³ 而洪長泰主張，中國是比蘇聯更有效的宣傳國家。³⁴ 大衛·布蘭登勃格(David Brandenberger)進一步豐富了宣傳國家的概念，他建議從三個不同的角度評估宣傳的效果——「製造、輸出和大眾接受」。在布蘭登勃格看來，這三者之間的不一致導致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宣傳方面收效不佳，最終消弭了宣傳國家運作的效力。³⁵ 這三個方面中，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往往聚焦於「製造」這一核心問題。對他們而言，「propaganda」一詞雖在英文中常含貶義，但在中國政治和文化的語境中卻是可以接受的，因為常用於翻譯「propaganda」的中文詞彙「宣傳」，意指「宣揚自己認為正確的理念，含有宣揚正統觀念的

31 Chang-tai Hung, *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8. 這類研究還包括Wu, *Remaking Beijing*; Shuishan Yu, *Chang'an Avenue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2); Yan Li, *China's Soviet Dream: Propaganda, Culture, and Popular Imagin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8)。

32 關於中國共產黨如何努力將北京改造為一個重要的政治空間，請參見 Chang-tai Hung, *Politics of Control: Creating Red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21), 131–150。

33 Peter Kenez,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 1917–1929*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8.

34 Hung, *Mao's New World*, 18.

35 David Brandenberger, *Propaganda State in Crisis: Soviet Ideology, Indoctrination, and Terror under Stalin, 1927–1941*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2.